

三维转换视角下《声声慢》 三种英译本对比 分析

贾双双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5年10月29日；录用日期：2025年12月5日；发布日期：2025年12月23日

摘要

生态翻译学作为近年来中国学界提出的重要翻译理论之一，强调翻译是译者在特定生态环境中进行“适应与选择”的过程。译文被视为译者对语言、文化与交际生态系统综合适应的结果，其理想状态是实现三维度的整体协调与最优平衡。李清照《声声慢》作为宋词艺术的高峰之作，语言精炼、情感深挚，蕴含浓厚的文化意象与女性主体意识。诗词的跨语言转换不仅面临语义与韵律的双重障碍，更涉及文化内涵与审美心理的再生。因此，本文以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理论为框架，从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三个方面对《声声慢》的三种英译本(林语堂、许渊冲、杨宪益夫妇)展开分析，并尝试得出“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本。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声声慢》英译本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Slow Slow Tune*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Shuangshuang J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October 29, 2025; accepted: December 5,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23, 2025

Abstract

Eco-translatology, a significant translation theory proposed by Chinese scholar Hu Gengshen, conceptualizes translation as a process of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conducted by the translator within a specif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 translation is thus the outcome of the translator's adaptive choices across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with the optimal translation achieving the highest degree of integrative harmony among these dimensions. Li Qingzhao's *Slow Slow Tune* stands as a masterpiece of Song poems, noted for its refined diction, profound emotion, and rich cultural symbolism. Translating such a poem entails not only linguistic and rhythmic challenges but also the transference of its cultural and affective depth.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s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of eco-translatology to analyze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Slow Slow Tune*—by 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Lin Yutang, and Xu Yuanchong, aiming to identify the version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integrated adaptive selection".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English Versions of *Slow Slow Tun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李清照的《声声慢》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词作的代表作之一，情感深挚，意象丰富，在宋代词史中占据独特地位。词中通过层层递进的节奏与叠字结构，细腻地展现了词人内心的孤寂与哀伤。作为兼具审美与文化象征意义的诗性文本，其英译过程不仅是语言转换的活动，更是文化传播与审美重构的过程。历来多位译者尝试将此词译介海外，其中以杨宪益夫妇、林语堂与许渊冲的译本最具代表性。这些译本在语言处理、文化取向与审美追求上各具特色，为古典诗词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系统梳理关于《声声慢》翻译研究的现状，有助于我们把握该领域的发展脉络、核心议题与未来趋向。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已从早期的印象式点评和单一译本赏析，发展为系统的、理论驱动的跨学科考察，其演进路径清晰地反映了翻译研究学科本身的范式转型。早期研究多集中于语言学与文本层面的对照分析，学者们借助关联理论、评价理论等工具，探讨译文如何传递原词的隐含意图与情感张力，并细致分析评价性语言资源的转换效果。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学者们的视线投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文化意象(如“梧桐”、“黄花”、“雁”)的翻译研究成为持续的热点，相关研究深入探讨了文化专有项的可译性限度以及各种补偿手段的得失。在美学再现维度，研究普遍围绕许渊冲先生提出的“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展开，尤其聚焦于叠词翻译这一核心难题。学者们细致比较了不同译者在处理首句十四字时所采用的音韵技巧(如头韵、辅韵、纵向行尾韵等)，评估其在再现原词音乐性与凄恻氛围方面的成效。然而，现有成果普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多以单译本为研究对象，缺乏系统的多译本比较；其二，研究重视语言与审美层面，却相对忽略了译者主体性及其在特定语境中的决策机制；其三，理论框架多为传统语言学或美学视角，尚未形成对诗词英译过程的动态解释体系。

近年来，随着译者研究与认知翻译学的发展，学界开始关注译者的文化身份、审美偏好与认知模式如何影响翻译决策。中国学者胡庚申提出的“生态翻译学”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视野。该理论以

“翻译即译者适应与选择的过程[1]”为核心命题，强调译者作为翻译生态系统的中心，应在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三个层面上进行动态的适应与选择。译文不再被视为单纯的语言替代，而是译者在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适应性选择后的产物。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下，“三维转换”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依据“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聚焦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方面，实现多层次的平衡与协调。诗歌语言高度凝练，富于节奏与韵律，其意象往往蕴含深厚的文化象征和情感张力。译者在跨语言再现诗歌的过程中，不仅要在语言层面克服韵律与形式的差异，更需在文化层面实现审美意蕴的再生，并在交际层面维系读者的情感共鸣。因此，诗歌翻译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在语言、文化与交际三维中的综合适应能力。鉴于此，本文以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理论为指导，从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三个角度，对《声声慢》传播度较高的林语堂、杨宪益与戴乃迭、许渊冲三种英译本进行系统比较分析。研究旨在探讨译者如何在不同生态语境中进行适应与选择，并揭示生态翻译学理论在古典诗词英译实践中的解释力与应用价值。

2. 《声声慢》三种英译本的对比分析

2.1. 语言维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关注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可体现在句法结构和节奏韵律的再现。在李清照《声声慢》的英译过程中，如何在保持语义忠实的同时再现原作的韵律，是译者在语言维面临的难题。通过比较杨宪益、戴乃迭、许渊冲与林语堂三种英译本，可以发现三者分别代表了“忠实直译型”、“音韵再现型”、“意象重构型”的不同语言生态策略。

首先，从开篇七组叠字，平音“寻寻清清凄凄”和仄音“觅觅冷冷惨惨戚戚”，齿音“寻寻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和唇音“觅觅”交错出现，使得行文抑扬顿挫、掷地有声[2]。这一组叠字不仅构成了强烈的音韵节奏，更表现出主人公情绪的层层递进。叠字在汉语中通过语音重复实现情感的渲染，而在英语中缺乏完全对应的结构。杨宪益、戴乃迭译为“Seeking, seeking, Chilly and quiet, Desolate, painful and miserable.”，采用语义直译方式，准确传达了词义，却未能体现原文的节奏美与递进感。许渊冲的译文“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3]”则通过内部押韵(drear/cheer)和重复句式实现了音节的均衡与旋律感，使原词的“声声慢”节奏在英语中得以再生。而林语堂则译为“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 [4]”，以英语形容词的连续叠加再现音韵效果，但由心理感受转向物理环境，情感色彩更趋冷峻、疏离。这三种处理方式显示出不同的语言维生态取向，即杨宪益夫妇译本偏重“语义忠实”，许渊冲译本注重“音美与情感平衡”，林语堂译本倾向“语音模仿与语境再造”。

其次，在句式结构和节奏安排上，原词以短句、对偶与停顿形成“慢而不滞”的语言节奏。如“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怎敌他、晚来风急”两句节奏分明，语调多变。杨宪益夫妇译文“Even when it's warmer there is still a chill, It is most difficult to keep well.”句式平直，信息完整，却缺乏原文的呼吸感与情绪起伏。许渊冲译作“How hard is it. To keep me fit. In this lingering cold! Hardly warmed up.”，以短句切分、对称结构与韵脚呼应(it-fit)，重构了节奏感与语气变化，强化了“难将息”的主观感受。林语堂译为“The weather, now warm, now cold. Makes it harder than ever to forget.”，其语言自然流畅，语义明晰，整体风格偏向散文化表达，节奏较为平缓。然而，其中对“难将息”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原词本义为“难以休养、调息”，而非“难以忘怀”。这一误译导致原词所蕴含的“身心俱疲、无以安顿”的情感色彩在英译中被削弱。相较之下，许渊冲在同句的译写中通过诗体化的句式结构，实现了“形式与情感的共生”，体现了语言维度中“形式功能双重适应”的典型特征。

最后，在押韵与音调的重建方面，三位译者的策略也各具特色。原词“戚戚”“将息”“风急”“相

识”等结尾音节形成内在的韵律统一。许渊冲秉持“三美”原则(音美、意美、形美) [5]，在英译中刻意设置押韵组，如“drear-cheer”“swift-drift”，以诗化语言再现原词的音乐感。林语堂虽未严格押韵，却利用语音重复与拟声词强化听觉效果，如结尾的“Pit-a-pat, pit-a-pat!”模拟雨声，使英语读者在感官层面体验“声声慢”的意境。杨宪益译文则更注重语义平稳与逻辑连贯，鲜少出现人为押韵，体现其“信而不饰”的翻译原则。由此可见，许渊冲的译文在音韵层面的创造性转换，使其语言维的生态平衡更为充分。

综上所述，从语言维的角度来看，三位译者分别构建了不同的英诗语体生态。杨宪益夫妇追求“忠实与清晰”的语言生态，语句平稳、语义明确，适合学术读者理解；林语堂采用自由诗体、节奏松弛，语言带有浓厚的个人风格，更贴近西方散文诗传统，此外通过声音模仿与句式延展实现跨文化的感知重构；许渊冲则在诗体化结构与韵律节奏中实现了“音、意、形”的三重统一，在保留原词语言节奏的同时，以英语诗体的格律特征重建了原作的音韵之美，因而在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上表现出最高的契合度与创造性。

2.2. 文化维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聚焦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和目的语双语之间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以促成语义、意象与价值观的“共生”。李清照《声声慢》作为中国古典词作中抒写女性孤寂心境的代表，其艺术魅力极大程度上来源于文化意象的层层铺陈与情感映射。词中“淡酒”、“雁”、“黄花”、“梧桐细雨”等意象不仅承载特定文化象征，而且构建了一个由自然物象到心理意境的复合意象系统。因此，在英译过程中，如何对这些意象进行恰当的文化转换，既保持原作意境，又使目标语读者得以感知其中的文化韵味，成为译者必须面对的文化生态挑战。

首先，从文化维的角度来看，“淡酒”意象的翻译处理集中体现了三位译者在文化符号转换中的不同适应程度。中国古典诗词中，“酒”常与“愁绪”“孤独”等情感意象相连，成为诗人寄托内心苦闷与自我慰藉的象征。“淡酒”一词尤具微妙意味，既有“欲以酒消愁而终不能”的无奈，又暗含情绪由浓转淡的心理过渡，体现出节制、清醒与哀婉并存的复杂心境。同时，“三杯两盏”中的数词并非实指，而是一种虚指的表达，用以形容“少量的酒”，在中国诗语中带有象征性的“分寸感”与“节制之美”。在此语境下，杨译“Three or two cups of light wine, How can they ward off the strong morning wind?”整体偏向直译，将“三”“两”译为“three or two”，表面上保持了原诗的形式结构，但忽视了其虚指的语义功能。英译后的数词在英语语境中被读者自然理解为确切数量，从而削弱了原作“少量”“不胜酒力”的意象含义，使得“淡酒”这一文化符号的含蓄与节制之美未能充分传达。此外，“light wine”虽然对应“淡酒”的字面意义，却偏向理性描述，未能再现其中的情感张力与象征深度。林译“How can a few cups of thin wine, /Bring warmth against the chilly winds of sunset?”则通过以“a few cups”替代具体数词，较好地化解了中文虚指难以直译的难题。“few”在英语中同样表达“小量”之意，与原诗虚指语义相契合；而“thin wine”一词则在视觉与感官层面呈现出稀薄、空寂的氛围，呼应诗人内心的孤清情绪。然而，林译整体保持了散文诗式的自由语感，虽具审美柔韧性，但在情感浓度上仍相对平缓。许译“By cup on cup, Of wine so dry, O how could I endure at dusk the drift, Of wind so swift?”则在语言与文化层面实现了更高程度的融合与创造。他以“cup on cup”表达连续饮酒的动作，既保留了“少量而不断”的诗意图景，又避免了数词直译的僵化；同时，“dry”一词既呈现了“淡”的口感，又暗示了情绪的清冷与孤寂，在英诗语境中建立起文化意象与心理氛围的双重对应。通过音义双关与节奏强化，实现了文化意象的诗化重构。相较之下，许渊冲译本在传达“淡酒”所承载的心理氛围与文化意境方面，展现出更高的审美契合度与创造性。

其次，“雁”意象的跨文化转换同样反映了译者的文化敏感度。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雁”是“传书

“寄思”的象征，常与离别、相思相关。李清照词中“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一句，以雁为触媒，引出记忆与哀思的交织。杨译“Wild geese fly past, while I'm broken-hearted; But I recognize they are my old friends.”传达上稍显直白，保留了诗句的语义框架与情感逻辑。“Wild geese”直接对应“雁”，“old friends”对应“旧时相识”，忠实地再现了原文意象的表层含义。然而，“old friends”在英语文化语境中多用于人际关系的具体指称，而非象征性比喻，因而弱化了原诗中“雁”作为“传思载愁”的文化象征。许译“It breaks my heart, alas! To see the wild geese pass, For they are my acquaintances of old.”则在语言韵律与文化意象之间寻求平衡。许译选用“acquaintances of old”，语义上更加正式疏离，契合了李清照笔下那种“似熟非熟、似近而远”的心境，避免了“old friends”的过度亲密语感。同时，许译通过诗行的节奏感与情感递进(由“breaks my heart”到“they are my acquaintances of old”)实现了情绪由感伤到自省的转化，既传达了“雁过”的视觉瞬间，也重现了“旧识”唤起的内心波澜。其译文在忠实原意的基础上，完成了情感层面的诗化重构。林译“I recognize the geese flying overhead. My old friend, Bring not the old memories back.”，“the old memories”则体现出较强的改写与再语境化倾向。林译将“雁”拟人化，直接呼唤“My old friend”，使意象转化为对话对象，强化了抒情主体的孤独感与内心独白的戏剧性。同时，他用“the old memories”取代“旧时相识”，将抽象的“相识”具象化为“记忆”，在英语语境中更易引发共鸣，也凸显出怀旧与自我追忆的情感主题。尽管这一改写淡化了“雁”在中国文学中“传书寄情”的象征功能，但成功地使“雁”的意象在目标语文化中获得新的诗学生命，实现了情感意义的再生。综上，三位译者在“雁”意象的处理上展现了不同层次的文化敏感度与审美取向。杨宪益、戴乃迭倾向于形式忠实，却在象征转换上显得拘谨；许渊冲则兼顾语言音乐性与文化意蕴，通过词汇微调保持原诗情感的深度与含蓄；而林语堂以创造性重构的方式，赋予“雁”新的语境意义，使其从“寄思之雁”转化为“记忆的触媒”。这种由“文化符号”向“情感意象”的跨文化再生，正体现了翻译作为“再创造”的艺术本质。

最后，“黄花”“梧桐细雨”等自然意象的转换，展示了文化审美差异下的意境迁移。“黄花”在中国文化中是重阳时节的象征，寓含岁月流逝与节物相思；“梧桐细雨”是古典诗词中忧愁的意象，李清照突出了它的过程，点点滴滴都在提醒自己的孤独、寂寞、失落、凄惨^[6]。杨译为“Chrysanthemums piled deep on the ground, the wutong trees under fine rain.”忠实再现了原诗意象的表层形象。“Chrysanthemums”准确对应“黄花”，“wutong”保留汉语音译以呈现文化特异性。然而，“piled deep”一词带有物理堆积之感，缺乏原诗中“飘零”“凋谢”的动态意象；而“fine rain”虽传达“细雨”之意，却较为客观平淡，未能体现诗中情绪的“清寂”与“哀婉”。此外，西方读者对“wutong”缺乏文化背景认知，其情感象征难以自然唤起，使得译文在文化意境层面略显疏离。林译“Let fallen flowers lie where they fall. And the drizzle on the Kola nut. Keeps on droning: Pit-a-pat, pit-a-pat!”则表现出明显的再语境化倾向。他舍弃“黄花”与“梧桐”的具象意象，改以“fallen flowers”与“Kola nut”替代，旨在将意象转化为西方读者可理解的文化符号。虽“fallen flowers”能传达花落之感，但“黄花”所蕴含的重阳时节象征已被削弱；“Kola nut”虽为热带植物，却与“梧桐”的清冷意境不符。林译以拟声词“pit-a-pat”强化听觉节奏，营造出凄清氛围，使英译诗更具感官活力。许译“The ground is covered with yellow flowers, Faded and fallen in showers. On plane's broad leaves a fine rain drizzles.”则在意象传达与文化适应之间实现较佳平衡。他保留“yellow flowers”以保持“黄花”的视觉象征，并通过“faded and fallen in showers”强化“飘零”“衰败”的动态美感，赋予译文柔韧的节奏与情感递进。“plane's broad leaves”译为“梧桐”，虽以英语熟悉的“plane tree”代替“wutong”，却在意象上达到了文化等值：皆为宽叶乔木，能承载“细雨滴落”的视觉意境。“fine rain drizzles”既保留原诗的温婉氛围，又在音韵上与前句押韵。综上，三位译者在“黄花”“梧桐细雨”意象的跨文化转换中展现了不同的取向。杨译忠于原文，林译大胆改写，追求情感共鸣。

却牺牲文化特质；许译则以“审美对等”为原则，通过词汇选择与节奏控制，使东方的秋意、哀思与孤寂得以在英语诗歌语境中自然流动，较为成功地实现了意象的“文化迁移”与“诗性再生”。

综上所述，文化维的分析表明，《声声慢》的英译过程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更是文化意象的重生。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保留了中国文化的“原生态”，是对源语文化的保护性适应；因为“意境的翻译方法 专在用字传神”^[7]，林语堂通过文化归化与意象重塑，使译文更具跨文化传播力；而许渊冲则通过象征延伸与音美协调，实现文化意象的审美再生。以生态翻译学的视角观之，这三种译法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多样性共生体”，呈现出《声声慢》在英译语境下的文化生态景观。由此可见，文化维度的成功转换，不仅关涉语言层面的对应，更体现了译者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寻求共鸣与平衡的能力。

2.3. 交际维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关注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李清照的《声声慢》以细腻深挚的女性情感著称，其语言中饱含孤寂、怀旧与生命感伤的多重心理色彩。因此，英译者的任务不仅是传达语义，更在于在跨文化交际中实现情感的有效传递与审美再生。

首先，从译者取向的角度看，三位译者的交际策略各具倾向。杨宪益夫妇以“忠实传神”为目标，倾向于“源语导向”的交际取向，强调信息的完整与情感的克制，使外国读者能够在理性层面理解词中哀婉的情绪。林语堂则采取“目的语导向”的交际取向，注重译文的可读性与情感流动。许渊冲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情感的等值转换”，以诗体形式在音韵、意象与情绪之间取得平衡。许译在音节与押韵中强化了哀婉氛围，形成语言节奏与情感节奏的共鸣，实现了交际维中的“情感协同效应”。

其次，从语气与情感传达的方式来看，《声声慢》的情绪结构呈现由冷清到哀怨、由自问到自怜的递进。译者如何在英语中重现这种情绪曲线，是交际维适应的关键。“怎一个愁字了得”一句，杨译“What immense sorrow I must bear!”杨译省略了原文的反问结构，采用感叹句式，语义清晰、结构简洁，忠实地传达了“愁”之巨大与不可承受。林译“To be expressed, By one word ‘sad’?”采取了截断句式与反问结构，突出了语气的激烈与顿挫感。许译“O what can I do with a grief, Beyond belief?”以“O”开篇，呼应原诗叹息式的语气，营造出直接的情感呼出：“what can I do with a grief”形成内心自问的语势，体现“怎一个……了得”的反问意味；“beyond belief”既夸张又婉转，暗示“愁”之不可名状，在意义上实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此外，许译通过内部押韵(grief / belief)形成音韵呼应，使情绪递进在节奏上自然展开。

综上所述，在交际维的层面上，许渊冲译本在音韵节奏与情感传递中达成审美上的共振，既保持原作的婉约风格，又实现情感层次的流动与回环，可谓形式与情感兼容。

3. 总结

通过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三维度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译者的翻译活动不仅是语言转换的结果，更是生态系统内多维要素协同作用的产物。首先，在语言维层面，译者面临古典词语言高度凝练与隐性表达的挑战。李清照以“叠字”、“节奏递进”等语言手法构筑哀婉细腻的语感，其语言形式本身即为情感的载体。杨宪益夫妇以忠实为宗旨，着力于语义对应的精准表达；林语堂注重语言的流动与节奏感，通过句式变换与词汇延展重生意象；许渊冲在音美、意美与形美之间寻求平衡，使词的声律与情绪得以跨语延续。其次，在文化维层面，《声声慢》的意象系统与文化象征构成翻译的核心难点。词中的“淡酒”“雁”“黄花”“梧桐”等意象，不仅是自然景物，更承载着宋代文化语境中特有的女性情感与审美传统。译者在处理这些文化符号时，既要保持文化的可识别性，又要兼顾目标语读者的可接受性。杨宪益的译本以保留文化原貌为主，呈现“异化”倾向；林语堂通过意象改写与语境重构，实现“归化型”文化适应；许渊冲则在意象保留基础上进行象征性再造，使文化意象获得普世审美价值。再者，在交际维层面，三位译者在情感传递与交际功能上形成互补关系。杨译注重信息准确，林语堂重视情感共

鸣，许渊冲追求形式与情绪的统一。交际维的比较显示，翻译是跨文化情感交流的过程，译者在交际环境中扮演“情感中介者”的角色。

总体而言，许渊冲的译本“整合适应选择度”略高于另外两个译本三维转换视角下《声声慢》英译本对比分析，不仅深化了对李清照词作跨文化传播机制的理解，也印证了生态翻译理论的应用价值。它提醒我们：翻译是一种文化生态行为，是在差异中寻求共鸣、在转换中保持生机的创造性实践。

参考文献

- [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 32(2): 5-995.
- [2] 孙芸珏. 论《声声慢》叠词翻译中“美学对等”的再现[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3(3): 129-133.
- [3] 许渊冲. 许渊冲译唐宋词一百首(汉英双语) [M].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21.
- [4] 林语堂. 古文小品译英[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5] 许渊冲. 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 2012, 33(4): 83-90, 127.
- [6] 孙绍振. 无处可寻、无处不在、无可奈何的忧愁——读李清照《声声慢》 [J]. 语文建设, 2008(2): 41-43.
- [7] 海岸选. 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